

目录

第1章 会话含意的理论观点与争议	1
1.1 会话含意的定义与类型.....	1
1.1.1 会话原则与会话含意.....	2
1.1.2 会话含意的类型.....	5
1.2 会话含意的理论观点.....	6
1.2.1 默认理论.....	6
1.2.2 关联理论.....	8
1.2.3 语义最小论.....	9
1.2.4 小结.....	10
1.3 会话含意与语境.....	11
第2章 会话含意理解的实证研究	14
2.1 话语语义理解.....	14
2.2 一般含意理解.....	16
2.3 特殊含意理解.....	21
第3章 研究问题与方法	25
3.1 研究问题的提出.....	25
3.2 研究内容.....	26
3.3 研究方法.....	27
3.3.1 行为测量.....	28
3.3.2 功能性磁共振成像.....	28
3.3.3 高精度经颅直流电刺激.....	29

第4章 特殊和一般会话含意理解共享和分离的神经机制.....	30
4.1 引言.....	30
4.2 脑成像 (fMRI) 实验.....	33
4.2.1 方法.....	34
4.2.2 结果.....	45
4.2.3 讨论.....	55
4.3 脑刺激 (HD-tDCS) 实验.....	58
4.3.1 方法.....	59
4.3.2 结果.....	61
4.3.3 讨论.....	67
4.4 小结.....	70
第5章 特殊会话含意理解中的语境信息加工.....	74
5.1 引言.....	74
5.2 行为实验.....	78
5.2.1 方法.....	78
5.2.2 结果.....	83
5.2.3 讨论.....	85
5.3 脑成像 (fMRI) 实验.....	86
5.3.1 方法.....	86
5.3.2 结果.....	91
5.3.3 讨论.....	100
5.4 小结.....	103
第6章 总讨论.....	104
6.1 实验结果总结.....	104
6.2 会话含意理解的理论模型.....	106
6.2.1 特殊与一般含意的分离.....	106
6.2.2 一般含意理解的推理过程.....	108
6.2.3 特殊含意理解的推理过程.....	111
6.3 创新性.....	114

6.4 研究展望.....	115
6.5 结论.....	116
参考文献.....	118
附 录.....	144
附录 A 实验一与实验二对话材料示例.....	144
附录 B 实验三和实验四对话材料示例.....	148
附录 C 中文版心理理论任务实验材料.....	153

本书彩色原图获取方式:

1. 官网下载: 登录 heep.fltrp.com/book → 注册账号 → 再次登录 → 在右上方搜索栏输入书名进行搜索 → 点击“图书产品” → 点击书名 → 点击“配套资源” → 下载图片。
2. 微信查看: 扫描下方二维码, 在线查看本书彩色原图。



第 1 章 会话含意的理论观点与争议¹

在人类社会中，言语是人们交际所使用的最核心、最普遍的方式（Clark, 1985, 1996; Holtgraves et al., 1989）。我们能够使用有限的语言符号产生无穷无尽的话语，表达丰富多样的概念内容，从形状清晰、颜色鲜明的具体事物，到看不见、摸不着的抽象概念，从复杂多变的行动，到暧昧矛盾的情绪。

更有意思的是，日常言语交际的过程中，对话的参与者们不会总是直来直去地表达自己的感受、意图和态度。说话人往往会在各种交际目的和动机的驱使下故意产生一些听上去有问题或意义不明确的话语，以委婉而谨慎地表达自己的真实想法，这使得某一言语形式具有了层次丰富的意义。为了实现成功的言语交际，听话人不仅仅需要理解话语的字面意义，而且还需要推测说话人隐含而未言明的意思。这些隐含的意义将如何被恰当地解读呢？这一问题不仅引发语言哲学界深刻的思考，也在语言学与其他学科的多个交叉领域引起广泛关注，它既是当前人工智能科学实现真实情境下人机交互和自然语言处理的技术难点（Holtgraves & Han, 2007），同时也是现今心理语言学（Noveck, 2001; Noveck & Reboul, 2008）和认知神经科学（Hagoort & Levinson, 2014; Noveck & Posada, 2003; van Berkum, 2009）亟待解决的热点问题。

1.1 会话含意的定义与类型

20 世纪 60 年代，哲学家和语言学家格赖斯（H. Paul Grice）提出了

¹ 本章部分内容已发表，见冯望舒，周晓林. 神经科学视角下的会话含意理解 [J]. 当代语言学, 2024, 26 (2): 259-273.

一个振奋人心的语用理论。格赖斯理论对社会言语交际进行了简洁而综合的描述，这为之后数十年的语用学研究奠定了基础。他的重要贡献在于区分了句子所说（what is said）和话语所含（what is implicated），并且提出了会话含意（conversational implicature）这一概念。

会话含意是指说话人有意暗示但并不明言的话语内容。更准确地说，会话含意是说话人使用话语所有意隐含的内容，它是话语内容的一部分，但是它并不是直接（或外显）的话语内容的组成部分，并且不由所传达的语言字面意义编码。会话含意，作为一种重要的语用现象，是格赖斯语用学（Grice, 1989）及其后理论发展的核心。格赖斯的观点要求对话参与者不仅要从言语层面来理解话语内容，还要从对方对语境的理解以及对对方的目的和意图的层面来理解。因此，会话含意这一概念处在有关语义学和语用学分界的争论的中心，这使得它一经提出便备受关注，并且在语言和社会认知的研究中扮演着核心角色。

1.1.1 会话原则与会话含意

格赖斯（Grice, 1975）认为，在言语交际过程中，对话的双方有着共同的目标，至少是有着彼此接受的共同方向。为了达到交际的目的，对话的参与者需要共同遵守一个原则，使得自己产生的话语能够迎合彼此共同的需要。格赖斯将这一原则命名为“合作原则（Cooperative Principle）”。合作原则进一步被划分为四类准则（maxims; Grice, 1975: 45-46），分别是：

1. 量的准则（Maxim of Quantity）是关于提供信息的量：
 - (i) 根据需要提供具有信息量的内容（出于当前的交际目的）；
 - (ii) 不说超出所需要的信息量的内容。
2. 质的准则（Maxim of Quality）要求“尝试提供你已知为真的信息”：
 - (i) 不说你认为是假的内容；
 - (ii) 不说你缺乏充分证据支持的内容。
3. 关联准则（Maxim of Relevance）要求提供具有关联的内容。
4. 方式准则（Maxim of Manner）要求保持清晰：

- (i) 避免晦涩的表达;
- (ii) 避免含糊不清;
- (iii) 要简洁明确 (避免不必要的赘述);
- (iv) 要有条不紊。

如果代入到日常生活中的交际实例,我们将不难发现,上述会话原则及其准则并不是通常意义上的科学定律,而更像是合同义务或法条。也就是说,如果有人打破了会话原则中某一准则的规定,这并不意味着这一准则被当前的“反例”证伪,反而这样的“不遵守”会产生十分有趣的交际后果。格赖斯(Grice, 1975: 49)指出,一个原本合作的说话人可能出于多种不同的原因而不能同时满足所有准则的要求。其一,说话人可能仅仅不想遵守一个或多个准则。比如,在记者会上公众人物选择不回答或不正面回答犀利的询问。其二,说话人可能遇到两个或多个准则之间无法解决的冲突(CLASH)。比如,说话人可能难以在满足量的原则的同时,满足质的原则,因为她/他可能缺乏充分证据以提供必要的信息量。其三,说话人可能轻视(FLOUT,“公然违反”)一个或多个准则。无论是面临准则间的冲突还是对会话准则的轻视都与会话含意密切相关,会话含意也恰恰是来源于(1)对这些准则的轻视,(2)在准则之间发生冲突时的顾此失彼,以及(3)引用准则作为解读话语的基础。比如,一个说话人在回答“你喜欢这位客座讲师的讲座吗?”的问题时,说“嗯,我确定他刚刚在讲中文”。这一行为明显轻视了会话准则中的量的准则,因为关于这位讲师演讲时所使用的语种这一信息并不足以构成“是否喜欢这一讲座”的充分信息,而说话人在听过这一讲座后显然应该掌握了回答这一问题所需要提供的信息。因此,说话人必定不情愿正面回答这一问题,进而可推知其话语中隐含的意义,诸如“我不喜欢这位讲师的讲座”。不难看出,在格赖斯理论框架下,会话原则及其准则不仅构成了说话人在日常言语交际中产生具有会话含意的话语的内在驱动力,也是听话人能够正确理解会话含意的重要依据。

当然,以上所列举的这些会话准则并不是制约我们产生和理解话语意义的唯一“压力来源”,比如:迎合审美的需要、符合社会道德的规范等等(Grice, 1975: 47)。比如, Davis (2010)提出了“风格(style)”准

则，即说话人产生的话语要符合说话人的身份特征和所处的时代背景，要优美、独特、令人愉悦和感兴趣。这种“风格”需要所带来的压力可能导致说话人违反方式准则乃至其他准则，比如，喜剧演员通过调整表达的方式或叙事的顺序来加强幽默的效果，特定人群通过使用晦涩的俚语来帮助构建特定的社会身份。另一个重要的准则是“礼貌 (be polite)” (Brown & Levinson, 1978, 1987; Lakoff, 1977)，事实上“礼貌”在日常生活中会给说话人造成非常强大的压力。说话人在很多情况下会优先考虑“礼貌”或者说“面子 (face)”的需求。在冲突出现的时候，“礼貌”可能会战胜其他所有的会话准则，使得说话人为了满足这一准则要求而违背其他的准则。这一准则在汉文化交际中体现得尤为突出，说话人在日常交际中往往会使用很多的委婉间接、晦涩曲折、模糊不清，甚至不尽不实的表达（不遵守包括量的准则在内的其他会话准则的现象），这都是出于对“礼貌”准则的服从。

此外，格赖斯还指出会话含意应具备一些特征，这些特征可用于识别会话含意 (Grice, 1975, 1989; Huang, 2015)。首先，会话含意具有可取消性 (Cancelability) 或可废止性 (Defeasibility)，即会话含意在某些语言或非语言环境中可能会被外显地取消。其次，会话含意具有不可拆分性 (Non-detachability)，即对于来源于量的准则、质的准则和关联准则的会话含意，任何具有相同语义内容的语言表达往往具有相同的会话含意 (通过方式准则产生的会话含意可能例外)。第三，会话含意具有可计算性 (Calculability)，即会话含意可以或多或少地以合作原则及其准则作为前提直接推导出来。第四，会话含意具有非规约性 (Non-conventionality)，即会话含意不应 (仅仅) 源自于话语的编码内容 (包括词汇和结构的特征)，而是在本质上源自于非编码的语用交互信息，这可以被视作可计算性的另一个侧面。第五，会话含意具有可强化性 (Re-enforceability)，即会话含意可以被外显地表达出来，而含意和外显表达的同时出现不会产生过多的冗余感。第六，会话含意具有不确定性 (Indeterminacy)，这是指由于会话含意是一个复杂推理过程的结果，在一些情况下会话参与者可能会对会话含意产生怀疑，从而使话语所包含的会话含意有些不确定，

甚至是开放式的。事实上，在日常交际中，由于会话参与者并非“全知”，他们对语境信息、说话人知识、说话人对听话人知识的推测等等方面都可能存在疑问，这使得对会话含意的怀疑很大可能会产生，所以会话含意往往是不确定的。

1.1.2 会话含意的类型

根据会话含意与语境之间的依赖关系，它可以被分成两类，分别是需要依赖于特定语境进行解读或理解的特殊会话含意（particularized conversational implicatures，后文简称特殊含意）和相对独立于特定语境的一般会话含意（generalized conversational implicatures，后文简称一般含意；Grice, 1989）。例如（Levinson, 1995: 92）：

语境 1：

A: What time is it? (现在什么时间了?)

B: Some of the guests are already leaving. (有的客人已经离开了。)

语境 2：

A: Where's John? (约翰去哪儿了?)

B: Some of the guests are already leaving. (有的客人已经离开了。)

在以上两个语境中，对话参与者 B 的话语都同时具有特殊和一般两种会话含意。格赖斯指出，如果说话人可以陈述含有更大信息量的命题（“All guests are already leaving”），那么他就会做出这样的陈述；但在上面的例子中，B 使用“some of”这一等级（<some, all>）中的弱项，而非其他更强的等级项（如 all），这使得听话人有理由推测，B 并不持有更强等级所描述的观点，或者至少 B 缺乏该观点成立的证据。因此，在两个语境下，听话人对 B 的话语都能够形成一个相对固化的解读，即“有的”但不是“所有的”客人已经离开了。这层意义属于一般含意，因为听话人不需要了解话语语境的具体特征，仅仅根据“some of”的使用就能够

意识到这层意思；这类包含等级弱项的话语同时具有否定等级强项的作用。与一般含意不同，B 的回答在上述两个语境中有不同的特殊含意：在语境（1）中，B 的话语具有“现在已经有些晚了”的含意；而在语境（2）中，它则表达“约翰可能已经离开了”的意思。后者的产生（理解）依赖于话语所处的特定语境，即在不同的语境下，相同话语的特殊含意可能发生改变。

1.2 会话含意的理论观点

格赖斯的理论无疑是具有革命性和启发性的。其后的研究者不仅极为认真地对待格赖斯对于交际行为的洞察，也在他提出的初始框架下不断充实、拓展乃至重新解释，以期能够构筑成更加完整、更加系统、更加自洽的理论体系。

格赖斯的理论旨在揭示含意在原则上如何产生，而其后的语用学研究则试图建立含意实际派生的认知模型。尽管格赖斯之后的语用理论都认为话语信息由说话内容的字面意义和说话人意图（对听话人的语境和特征的假设）共同编码，但是它们对上述两种会话含意（特殊含意与一般含意）的概念区分及其各自的认知机制持有不同的观点。下文将简述其中三种影响力较大的语用学观点，它们争议的焦点恰恰可以通过它们各自对特殊与一般含意关系的阐述来理清。

1.2.1 默认理论

在格赖斯的观点提出后，新格赖斯学派的研究者对格赖斯理论，特别是合作原则及其准则，进行了精简和修正，形成了会话含意两原则（Horn, 1984）或三原则（Levinson, 1995）的理论。他们的理论观点进一步明确说了说话人目标（想传递的意义）和听话人目标（理解到的意义）之间的紧密关系。针对含意理解，有研究者提出了默认理论（Default Theory; Levinson, 2000; Chierchia, 2004）。他们认同格赖斯对特殊含意和一般含意的区分，认为二者经由截然不同的语用推理路径产生，强调

由特定词汇或句法形式所驱动的意义在含意产生（理解）过程中起到的作用。

作为新格赖斯学派的代表，Levinson（1995, 2000）将话语意义区分成三个不同的层次：句子类型意义（sentence-type meaning）、话语类型意义（utterance-type meaning）和话语示例意义（utterance-token meaning）。其中，句子类型意义类似于格赖斯提出的“句子所言”的概念，而话语示例意义可以等同于说话人意义，是对言语行为的完全解读。话语类型意义则处于二者之间，由话语结构所负载，而不由话语所在的特定语境的性质来决定。

Levinson（2000）认为，一般含意超出了抽象的句子意义，但通常也不足以构成话语在具体语境中的完全解读，它处于中间层次，与话语类型意义相对应，由话语结构、而不是话语所在的特定语境的性质所负载。一般含意是话语的默认解读，由某些特定词汇或语言形式自动触发，经由一个自动的、基于启发式驱动（heuristic driven）的推理过程，在词汇层面（Levinson, 2000）或是句子局部（Chierchia, 2004）产生；只有在特定的句法环境中，在局部建立的一般含意解读才会在全局层次上被推翻，话语的语义解读才会得以通达。例如，等级弱项“有的”会触发推理，从而自发产生“否定较强等级项”（不是所有的）这一默认的等级含意（scalar implicature）解读，而不是“有的且可能是所有的”这一语义解读。只有当等级含意被明确取消时，其语义解释才会得以通达。虽然Chierchia（2004）反对这种发生在词汇层面的推导机制，但是他同样认为等级弱项的解读是一种默认状态。使用等级弱项总是会产生等级含意，除非在特定的句法环境中（例如，否定、疑问形式，以及条件式中的先行句）。

但是，特殊含意的语用推理过程与一般含意截然不同。它属于话语示例意义的层次，其产生不依赖于明确的指定规则，而是依赖于特定的语境假设，这种语境敏感的推理过程由听话人对说话人意图的考量所驱动。

1.2.2 关联理论

同样受到格赖斯理论的启示，Sperber 和 Wilson（1986）对言语交际提出了具有认知取向的新方案——关联理论（Relevance Theory）。该理论认为，人类言语交际行为的唯一原则是关联原则（Principle of Relevance），即任何言语交际行为的出现都包含着一个前提假设，那就是这一交际行为本身与其所在的语境具有关联。不同于格赖斯理论，关联理论反对言语交际的参与者会刻意遵循某个原则的说法，认为人们不可能做出与关联原则相违背的交际行为，因为人类认知的基本方式就是寻求和建立信息间的关联性。从关联理论的角度看，格赖斯对特殊含意和一般含意的区分不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二者均需要在特定语境的情况下产生，其推导过程共享相同的认知机制。

根据关联理论，有三种可能的话语理解阶段或层次：修复不完全的逻辑形式，扩展或补全这些逻辑形式并产生明示（*explicature*，即话语所说的），而后进一步推导任意含意（*implicature*，即话语所隐含的内容）。构建明示和推导含意的过程均由关联原则驱动，最终得到当前语境下的最佳解读，该解读能够在语境效果和加工努力之间取得平衡。可能的话语解读由一个仅含消除式规则（*elimination rules*）的自动发生的演绎机制产生，这一机制会不断地消耗认知努力，从已知内容中提取信息，构建话语解读，直到某一解读突破关联阈限，个体就有理由将其当作说话人有意传达的内容（Sperber & Wilson, 1986）。因此，这一推理系统并不指向最佳的解读，它的关键在于使自动进行的推理停在相对理想的位置上。

也就是说，对关联理论而言，不论是把逻辑解读（如“有的”的逻辑解读为“有的且可能是所有的”）还是语用解读（“有的但不是所有的”）当作等级项（“有的”）的默认解读都是不正确的。尽管“有的”这一词条的释义是较弱的逻辑解读，但是包含该词的话语在具体使用中被解释成何种解读完全取决于语境的关联约束。无论哪种解读，只要在当前语境下达到了关联阈限，都可以构成该话语的正确解释。同样，所谓特殊含意的推导也遵循这一模型。

可见，从关联理论的观点来看，格赖斯对于特殊含意与一般含意的区分是没有价值的。一般含意和特殊含意的理解途径都遵循语境关联的原则；这就意味着，同样是进一步推理可能产生的结果，它们将通过相同的择优机制被选出来，且择优的依据是话语所处的语境特征（Carston, 1998）。

1.2.3 语义最小论

语义最小论（Semantic Minimalism）延续了形式语义学的传统，旨在重新考虑格赖斯对句子所言和话语所含的区分，解决如何划清语义内容和语用内容（非语义内容）之间的边界这一问题。该理论立足于人类言语交际中语义和语境的关系，认为句子的语义内容是其全部话语共同的意义内容；也就是说，无论语境为何，句子的语义内容是固定的（Cappelen & Lepore, 2005）。它反对语境无限制地影响话语意义，挑战包括关联理论在内的语义语境主义观点。针对特殊含意和一般含意的区分，语义最小论持有相对调和的观点。它认为，特殊和一般含意的认知过程不同，但并非截然不同，一般含意的认知过程可以被认为是特殊含意认知过程的一种抽象或固化的形式。

语义最小论认为，如果某一解读包含了不由句子的句法成分直接贡献的部分，那么这种解读就属于语用内容（Borg, 2004; Cappelen & Lepore, 2005）。语义内容可以仅通过计算操作来复原，但语用内容则需要依赖于非形式化的溯因推理过程来复原。例如，当说话人将“有的客人已经离开了”作为“现在几点点了？”的回答时，听话人第一感觉是“不合理”，因而就会寻求其背后可能的原因。当听话人发现，说话人想委婉或模糊地表达“现在已经很晚了”的意思，那么这句话就可以理解了；听话人有理由相信，说话人想表达的意思正是“现在已经很晚了”。

在语义最小论的理论框架下，特殊含意属于典型的语用内容，它的理解过程完全依赖于对当前特定语境下说话人心理状态的推测，而一般含意则有所不同。一方面，语义最小论认为一般含意属于语用内容。比如，话语“有的客人已经离开了”的一种解读“有的但不是所有的客人

已经离开了”属于语用范畴，因为此种解释已经超出了仅仅由复原词汇信息及其规则所能得到的内容。另一方面，一般含意往往不能构成话语的完整解读，因为它的推导可以通过听话人以往的言语交际经验得出，而不依赖于获取当前语境下说话人的心理状态（Borg, 2004, 2009）。例如，在理解“有的客人已经离开了”时，听话人只需要知道通常一个人说“有的”就是传达“有的但不是所有的”，就能够成功地复原这一话语的一般含意。显然，这个信息仅仅通过综合以往对话交流的经验就能够获得，它不需要听话人对说话人当前的心理状态进行推测。据此，语义最小论认为，特殊和一般含意的理解分别依赖于两个相互关联的语用系统：一个完整而一般化的语用系统负责复原特殊含意；另一个更加局限的、更加语境不敏感（胶囊化）的语用系统负责复原一般含意，该系统可以看作是对完整语用系统的抽象，其中发生的计算过程是基于过去会话交互中有关说话人意图的统计事实而进行的（Borg, 2009: 79）。

1.2.4 小结

尽管上述三种经典的语用学理论都认为理解特殊含意依赖具体的语境特征，但这三种理论对一般含意和特殊含意各自的加工过程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持有不同的看法（示意图见图 1.1）。默认理论强调二者之间的差别，认为一般含意独立于语境，进而将一般含意和特殊含意的认知过程完全区隔开来：一般含意的生成涉及默认的、自动的、基于启发式驱动的推理；而特殊含意的生成则涉及一次性的、语境敏感的推理，由特定说话人的意图驱动。与之相反，在关联理论的框架下，特殊含意和一般含意之间的区别基本消失，所有含意都是听话人在关联原则的驱动下对话语进行的进一步解读，而这些含意的理解过程都是建立有效关联与付出加工努力之间的权衡和择优过程。语义最小论保留了特殊含意和一般含意之间的直观分界，认为特殊与一般含意理解同样需要语言模块的参与，但两者分别涉及两个相互关联的推理系统：特殊含意的理解需要基于对说话人意图进行预期的溯因推理，这需要调用一个全局的、一般化的语用系统；而一般含意的理解需要基于统计事实和计算的推理，这需要调用一个更局域的、更加胶囊化的语用系统。

通过总结上述理论观点，我们不难发现，语言学家并不满足于简单描述会话含意这一语言现象，而是将它看做是由个体发出的言语交际行为的部分，并致力于揭示其背后的认知过程。持续存在的争议说明，传统的内省或语料分析无法为语言认知的具体过程提供充分的事实依据。随着心理学和神经科学实验技术的发展，研究者能够直接或间接地观测或影响人脑中的神经活动，这为深入揭示语言的神经生物学基础、还原人类言语交际行为背后的心理和认知机制提供了重要的信息。要深入探究特殊含意和一般含意之间的关系，我们不应该仅仅着眼于考量各个理论对语言现象的解释力，也应该从心理学和神经科学的角度来审视各个理论假设对实验事实的预测力，在更加开阔而全面的视野下对语言的认知模型进行构建、验证和修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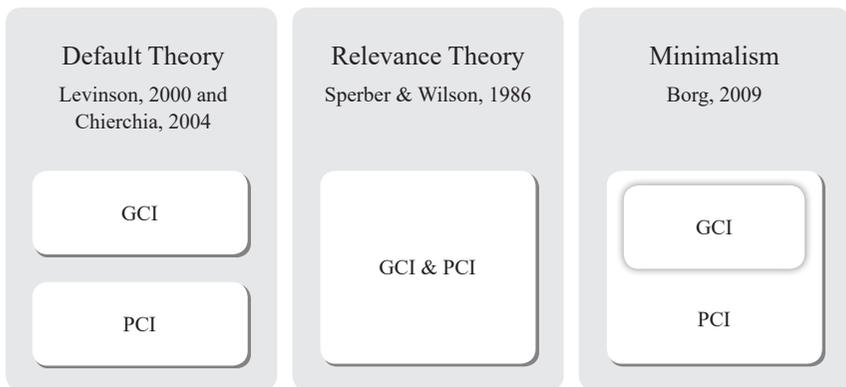


图 1.1 三种语言语用学理论对特殊与一般含意的不同假设的图示。

1.3 会话含意与语境

在言语交际的实践中，仅仅通过解码对话语意义进行恢复往往不能够确定说话人的意思表达，话语意义的解读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所处的语境（Sperber & Wilson, 2002）。话语中可能存在需要解决的歧义和指称矛盾、需要填补的省略、需要识别的含意，以及需要解释的隐喻和反讽等等。这些均需要利用语境信息进行加工。对话的参与者不仅需要认

真地听取对方话语的语义内容，而且需要敏锐地洞察语言所处的环境，唯有如此他们才能够自如得体地做出恰当回应。

语用学正可以被认为是研究话语在特定语境中的用意，主要关注语言外的设定或环境特征如何在确定为何一个话语传达某一特定语义内容的过程中发挥作用。据此，语用学也可以狭义地被认为是围绕语言行为的产生和理解如何超越语义规则，或者更广义地被认为是涉及探索两个或更多个体作为一个复杂的交互单元如何实现互动（Clark, 1996）。任何关于语言表达形式与其表达内容之间关系的理论，都不能够忽视它所处语境的作用。会话是一个动态的交互过程，其中语境不仅制约着说话人对话语的组织 and 构建，而且也制约着听话人对话语的复原和解读。

时至今日，语境作为语用学研究的核心概念，仍然是一个广泛而模糊的概念。语境被认为包括了各个层面的影响语言表达形式意义的复杂因素，比如语言层面的、认知层面的、物理层面的、社会层面的、文化层面的（Lyons, 1977；何兆熊，1987；何自然、冉永平，2002；陆俭明，2024；王建华，2002）。最初的人类语言学研究将语境定义为言语活动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里所处的境况，并将其分为语篇语境、情景语境和文化语境（Malinowski, 1923）。这一分类洞见了影响话语生成和解读的既定环境因素，包括会话或篇章中话语或句子的上文和下文，言语活动发生当下的客观环境（如，交际发生的时间和地点，交际参与者的身份、地位和彼此之间的关系），以及历时积累的社会文化背景等。

然而，当研究者试图解释为什么话语具有偏离其语言内容的意义时，他们意识到相比于给定的客观环境因素，话语理解更直接地受到会话参与者的认知环境（cognitive environment）的影响（Sperber & Wilson, 1986；冉永平，2000）。个人的总体认知环境包括了她在/他此时此地所意识到的和能够意识到的所有事实和假设。相同的事实和假设可能会出现在几个人的认知环境中。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认知环境是交叉的，其交叉部分就是他们共享的认知环境。在这一理论框架下，语境是一个动态构建的心理组件，也被称为认知语境。一般认为，构成语境的要素是说话人和听话人在某种意义上共享的知识，或者说是说话人认为自己与

听话人共享的那些知识。在言语交际的过程中，话语意义的生成与理解涉及到认知语境的动态构建（何兆熊、蒋艳梅，1997）。认知语境既是言语活动作用的对象，又是解释言语活动的相关信息来源（Stalnaker, 1998）。会话参与者从某些共享的信息或假定共享的信息出发，他们所进行的言语活动旨在影响这些信息的集合。如果一个话语的核心是传递信息，它的内容将是一条信息，如果其交际目的达成，那么该信息将成为信息集合的一部分，进而为后续话语提供语境。

会话含意需要依赖于语境信息进行复原。一方面，一般含意基于一些笼统的社会“规则”，不涉及话语所处环境的具体情况。比如，当被问及薪资时，一个职员回答“不到10万”，那么听话人就有理由认为说话人的月薪应该处在大几万的水平，因为“不到X”通常意味着“至少接近X”。然而，一般含意与逻辑推理的情况不同，因为它们可以被与其不一致的陈述所抵消（即含意的可取消性）。例如，在上面的示例中，说话人可以毫不矛盾地添加：“……税后三千多”，从而消除了通常源自“不到X”的含意，并且这一添加的表述也没有造成逻辑上的错误，或者使得前面的话语成为一句谎言。另一方面，从格赖斯对特殊与一般含意的划分上不难看出，听话人对话语中特殊含意的复原依赖于高度语境化的推理。试想，当说话人处在一间闷热的屋子里，她/他说出“好热啊”，就很可能包含着“请打开窗户/空调”之类的间接要求的含意。第一，最明显地，这种含意解读的实现依赖于假设的共同知识语境，即听话人与说话人需要共享关于“开窗户/空调能够减轻人们感觉到的炎热”的知识。其次，这种含意解读需要听话人对双方共享的情景语境的深度体察：对话双方处在关着窗户/空调的房间里。关联理论指出，话语与语境之间的关联是推动会话含意理解的唯一依据。只有话语解读与语境之间的关联超过关联阈限时，该解读才能够被接受。因此，当话语的语境关联降低时，听话人就需要付出更大的努力来理解它所蕴含的会话含意（Carston, 2004; Sperber & Wilson, 1986）。